

“三八大盖”与两首著名歌曲

□ 徐平

一提起“三八大盖”，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抗日战争。“三八大盖”即三八式步枪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的标志性武器之一，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。然而，“没有枪、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”，抗战中我国军民也缴获了大量的三八式步枪，并使其成为打击侵略者、保家卫国的武器，书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数不尽的传奇，成为我国军民同仇敌忾、不畏强暴的一个符号。音乐工作者将其写入歌中，充满战斗精神的歌曲至今激励着人们奋勇向前。

“三八大盖”

1905年，三八式步枪在东京小石川炮兵工厂定型生产，当时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的年号明治三十八年，因此被命名为“三八年式步兵銃（步枪）”，简称“三八式步枪”或“三八步枪”。后来，三八式步枪成为日本步兵的制式步枪。三八式步枪结构简单，配装6.5毫米口径枪弹，射击时后坐力小、易控制，可靠性和准确度较高。因其枪机上有一个拱形防尘盖，在中国俗称“三八大盖”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三八式步枪被大量缴获，并成为抗日军民向侵略者复仇的利器。1938年10月下旬，八路军359旅在山西广灵县伏击日军北线指挥官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的车队。开国少将彭清云当时是359旅719团教导员，也是出了名的神枪手。战斗打响后，彭清云发现几个日本兵退缩到汽车旁，其中一个胖军官躲在汽车后，挥着战刀叫嚷。彭清云要过一支“三八大盖”开了一枪，胖军官当即倒地毙命。打扫战场时确认，这个胖军官就是常冈宽治。1945年7月，在攻打高密县墩上日军据点时，八路军115师神枪手张兴来使用三八式步枪击毙日军指挥官和机枪手20人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三八式步枪继续被我军用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再次立下赫赫战功。在新中国成立的阅兵仪式上，不少解放军战士也是背着三八式步枪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。



电影《战火中的青春》里青年英雄排高唱《战斗进行曲》

《战斗进行曲》

我擦好了三八枪，我子弹上了膛；我背上了子弹带呀，我心里直发痒。

这首《战斗进行曲》诞生于1946年10月，即我军战略防御阶段。张家口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文艺工作者韩塞和王佩之，看到战士们擦好三八枪英勇上战场、缴获大批美式装备的场景后，激发了创作灵感，迅速写出《战斗进行曲》。

与抗战时期大多数军歌的凝重、威武不同，《战斗进行曲》轻快、活泼，以战士的口吻唱出了我军的高昂士气与必胜信念，受到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喜爱。它与同时期另一首充满战斗精神的歌曲《说打就打》，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流传最广的军歌，也是我军保留的队列歌曲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《战斗进行曲》作为弘扬战斗精神的歌曲，仍继续传唱，曾出现在许多音乐出版物中，并被改编成手风琴曲、木琴曲、钢琴曲等多种器乐曲。1959年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——《战火中的青春》，将《战斗进行曲》作为插曲。影片中，在一次战斗胜利之后，青年英雄排排长雷振林和全排战士高唱《战斗进行曲》，伴随着激昂、奔放、充满战斗精神的旋律，战士们脸上洋溢着

革命必胜的光芒……

在同年10月出版的《解放战争时期歌曲选集》中，《战斗进行曲》的曲谱又作了一些改动。改动后的《战斗进行曲》更加活泼跳跃，更具有战斗性。

《说打就打》

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，练一练大盖枪，刺刀手榴弹。

这首诞生于解放战争初期的歌曲《说打就打》，表现了我军武装自卫、坚决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决心和勇气。

1946年的东北战场，东北民主联军加紧练兵、准备应战，呈现出热火朝天的训练场面。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文工团的创作员庄映和第10纵队28师政治部宣传科的谢明，被这样的场景深深感染，产生了强烈的创作热情。两人决定联手创作一首能反映部队高昂士气、激发官兵战斗意志且通俗易唱的歌曲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、修改，由谢明作词、庄映谱曲的《说打就打》在辽沈战役打响前夕诞生。

歌曲创作出来后，纵队文工团员分头下部队教唱。时任第10纵队28师84团2营副教导员的王子健回忆起那时的场景：“部队开饭和集会前唱，走向训练场和结束训练时唱，甚至一些老乡的小孩也跟着会

唱了。士气高昂的部队驻地到处飞扬着‘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……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，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！’的歌声，有力地激发了官兵打下开原、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。”

《说打就打》一诞生就受到部队官兵的喜爱，先是在纵队传唱，很快就在东北野战军传唱开了。后来第47军在湘西剿匪时，各部队在被上级询问有没有决心打胜仗时，他们经常回复说：“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！”

歌曲表现出我军官兵豪爽的性格和敢打必胜的信心，歌词中的“说打就打”“说干就干”，正是我军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必胜的军事作风的写照。《说打就打》作为一首充满战斗精神的歌曲，是解放战争时期最优秀的军旅歌曲之一，也是我军一首保留的队列歌曲。

这首歌曲在传唱期间，根据形势发展和部队实际需要，对个别词句作出修改，将“练一练大盖枪”改为“练一练手中枪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部队集合、列队行进、放映电影前和准备开饭前的时间，《说打就打》是唱得较多的一首歌曲。《说打就打》先后被录入1951年出版的《解放战争时期歌曲选集》、1983年发行的中国唱片盒带《中国革命历史歌曲》、1991年出版的《军营歌曲精选》和2010年出版的《军歌嘹亮》等丛书、唱片、新媒体音乐库。

《战斗进行曲》和《说打就打》是充满战斗精神的歌曲，体现了战士们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的胜利信念。战斗精神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。无论何时，《战斗进行曲》和《说打就打》所弘扬的战斗精神都将在我们这支人民军队中代代传承，生生不息！

（摘自2023年12月7日《中国国防报》，原标题为《“三八大盖”与我军两首著名歌曲》）



从北京到太行山深处河北省阜平县的木兰村，自驾车需要4小时左右的时间。而在十几年前通往阜平的高速公路尚未开通的时候，早晨8点从北京出发，一路换乘火车、大巴，抵达木兰村时往往已经傍晚时分了。这条路，77岁的邓小岚已经走了17年。

“人家老爱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到木兰村去？”

2004年开始，邓小岚每年都把半年左右的时间放在木兰村，为深山里的孩子义务教授音乐课程。邓小岚从小喜欢音乐和艺术，她说，唱歌是很快乐的一件事，如果一个人会唱歌，在生活中无论他高兴、难过还是受到挫折的时候，音乐会是他的一个最好的朋友。但在退休后最初来到木兰村的时候，邓小岚发现，大山的阻隔，几乎让这里可爱的孩子们失去了享受音乐带来快乐的权利。

从刚开始教孩子们唱简单的歌曲，到教他们演奏乐器、拉小提琴，再到连续四届举办木兰儿童音乐节……北京来的邓奶奶给大山里的孩子带来了无尽的欢乐，孩子们的童年也因为音乐变得绚丽多彩。

1943年的冬天，在日寇“扫荡”的阴影下，邓小岚就出生在木兰村旁的山林之中。抗战期间，《人民日报》前身之一的《晋察冀日报》便驻扎在木兰村。这里是邓小岚出生的地方，也是她的父亲邓拓、母亲丁一岚和众多革命前辈战斗过的地方。

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成长在革命的家庭，父母的志向和经历深深影响着邓小岚。入读清华大学前，还在读高三的邓小岚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这份申请书随后被她就读的高中转给了清华大学。进入清华后，心中的热情又促使邓小岚再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
邓小岚说，在这方面，虽然父母都是老党员，但他们没有给自己提什么要求。邓小岚有自己的感悟：“真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这是非常浅显，也非常深刻的一个道理。我们国家就是因为有了共产党，才从那样一个被压迫被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。”

母亲丁一岚是开国大典的播音员，父亲邓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长期执掌《人民日报》，“我觉得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队伍里的战士，我也要做这支队伍的一个战士。他们的行动，一直在潜移默化地给我指导”。

邓小岚入党宣誓那天，是1965年的4月28日。在之前确定她入党的会议上，邓小岚发言的题目是《从乌兰诺娃到乌兰牧骑》。

加林娜·乌兰诺娃是苏联著名的芭蕾舞演员，也是邓小岚青少年时代的偶像。“大一我再次申请入党时，老师跟我讲，要弄清自己加入共产党是为了什么。那个年代，劳动人民没有机会看到芭蕾舞，草原上的乌兰牧骑在艰苦的条件下给牧民演出，受到劳动群众和全国人民的喜爱。我就觉得生活、工作都应该为更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，要是比较起来，乌兰牧骑是更值得敬佩的。”邓小岚说，这就是当时二十出头

退休后在木兰村支教十七年

□ 白波

邓拓女儿邓小岚：



的自己面对入党时单纯而真实的想法。

特殊的历史时期曾给邓小岚的家庭造成很大冲击，但她坦言，自己对党的信任和感情从未改变，这也是父亲和母亲自始至终对她和弟弟妹妹们的教育，“听说我要入党，他们都特别鼓励。后来妈妈也一直跟我说要相信党”。

为什么要到木兰村去？为什么义无反顾在退休后把自己几乎一半的时间献给了那座小山村？邓小岚说，父亲和母亲的青春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。在生活方面，那当然是他们一生中最困难最艰苦的一段日子，但在精神方面，那又是他们一生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，因为他们在那时候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对党对人民作出的贡献最多。

沿着父母的足迹，77岁的邓小岚仍旧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北京和木兰村之间。“我相信美妙的音乐总能让人联想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。在音乐陪伴下成长起来的孩子，一定能够乐观、积极地对待生活。”邓小岚说。

（摘自2021年6月25日《北京日报》）

杰桑·索南达杰：用生命守护可可西里

□ 姜峰

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城，一处普通的藏式民居，门上挂着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子。这里是杰桑·索南达杰的故居。

1954年，索南达杰生于治多县索加乡，1974年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后，他放弃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，毅然回到治多草原，参与家乡建设，曾担任教师，也做过乡党委书记，是党培养起来的优秀年轻干部。

治多县西部，是一片无人区，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天堂，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可可西里。藏羚羊，是这片原野上的精灵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用藏羚羊的绒毛制成的“沙图什”披肩，在中亚、欧美市场能卖到5万美元，不法分子纷纷涌入可可西里，藏羚羊盗猎行为一度增多。

1992年，已升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的38岁的索南达杰挺身而出，推动成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，并担任治多县西部工委委书记。从成立第一天起，这个特殊机构的使命，就是保护可可西里，就是反盗猎。

治多县西部工委成立后，索南达杰曾带队先后12次深入无人区，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保护藏羚羊为主的环

态保育工作，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猎集团8伙，有效打击了盗猎者的嚣张气焰。

1994年1月18日，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，缴获了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；在押送犯罪分子行至太阳湖附近时，他们遭到犯罪分子袭击。索南达杰在无人区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人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匍匐于地，右手持枪，左手拉枪栓，怒目圆睁，早已被风雪塑成一尊冰雕……

索南达杰的牺牲，唤醒了全社会对可可西里保护的关注与重视。

昆仑山口，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前，不少途经青藏公路的行人停车驻足于此，藏族群众放上哈达、青稞酒、松柏枝、糌粑，表达对索南达杰的敬仰之情。

索南达杰的外甥秋培扎西，主动申请调到环境最艰苦的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局，巡护无人区、保护藏羚羊。

从治多县西部工委，到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再到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，这些年来，一代代保护者们前赴后继守护在先辈浴血奋战过的土地。（摘自2021年6月9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群英盛会的光荣见证

□ 朱慧娟



海军首届英模代表会议纪念章

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展厅内，陈列有一枚纪念章。它宽5厘米，呈五角星叠加光芒状，配有蓝白条纹绶带，五角星中间刻有八一军徽和铁锚，象征着人民海军。纪念章表面虽有些许斑驳，但铸刻的“海军首届英模代表会议纪念”字样清晰可辨。

为表彰海军英雄模范人物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1953年3月5日至15日，海军在北京召开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。会上，海军领导向参会的全体英雄、模范、功臣和集体立功单位的代表，颁发了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纪念章和证书。这枚纪念章见证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第一次

规模空前的群英盛会，彰显了我军开展立功创模活动的优良传统。

5日上午，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。司令员萧劲光，副司令员王宏坤、罗舜初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，参谋长周希汉，后勤部部长张汉丞、政治委员刘义等出席了开幕式。参加会议的英雄模范个人代表48名、单位代表10名、列席代表153名。萧劲光作了题为《为人民海军事业树立更多的功勋》的讲话。他号召海军广大指战员必须向“建设一支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”的目标努力前进，要有“保卫祖国海洋，保卫祖国安全”的荣誉思想，希望大家保持光荣、发扬光荣，争取更大的光荣，为人民多立功勋。

出席大会的英雄模范代表在建立、发展人民海军的艰苦历程中都曾立下不朽功勋。其中，有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的副艇长王维福，有机智灵活、以寡胜众的优秀指挥员陈立富，还有视死如归、迎风搏浪的战斗模范赵孝庵……现场气氛热烈，英雄模范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，讲述了他们忠诚履职、不负人民的光辉事迹。

会议期间，朱德总司令到会并讲话，广大官兵备受鼓舞。他指出：海防在整个国防中占着特别重要的位置；把海防巩固起来，是人民海军的头等任务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，你们应

该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，很好地研究战术，把海上战斗技术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；你们不仅应该懂得海军性能，学会使用海上战斗的武器，而且要做到一旦发生战斗，不管使用什么武器，你们都可以对付和消灭敌人。朱德总司令还为代表会议题词：“高举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，建设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，把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敌人歼灭在海洋上！”

15日，在闭幕大会上，全体英雄模范代表一致通过了《向毛主席、朱总司令致敬电》《向志愿军致敬电》和《给全海军指战员的一封信》。大家纷纷表示，一定要牢记党的教导，深刻领悟海军首长的指示，吸收借鉴先进经验，把祖国赋予的建立和巩固海防的神圣任务担负起来！

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的召开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海军指战员英勇顽强、不畏困难、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增强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感、责任感和荣誉感，形成了“英模之间比一比、战友之间追一追”的良好氛围，对官兵的战斗意志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。

一枚徽章，一页历史；一枚徽章，一生荣耀。这枚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纪念章，见证了海军英雄模范担当奉献的崇高品格，也承载着革命军人的荣光。（摘自2023年11月19日《解放军报》）